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23年 第6期 (总第240期)

佟家栋 赵思佳

服务业开放是否能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碳减排

王珊珊 蔡礼辉 李月

经济制裁、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毛其淋 钟一鸣

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模式

——非正式融资渠道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证据

余泳泽 朱子玥 尹立平

环境目标约束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2023年6月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

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单月刊 2023年第6期(总第240期)

目 录

服务业开放是否能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碳减排	佟家栋 赵思佳 (3)
经济制裁、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王珊珊 蔡礼辉 李 月 (21)
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模式	
——非正式融资渠道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证据	毛其淋 钟一鸣 (40)
环境目标约束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余泳泽 朱子玥 尹立平 (59)
国际友城与企业走出去——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韩永辉 王贤彬 韦东明 (78)
向央行借款对银行声誉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	张清俊 李 成 (95)
银行竞争有助于化解系统性风险吗	
——基于僵尸企业贷款、同业业务及私人部门存款渠道	顾海峰 卞雨晨 (113)
城市规模、方言多样性与劳动者工资	朱诗慧 苏章杰 (134)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侵蚀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李小荣 毕英睿 (154)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代际居住模式	沈 煜 孙文凯 (173)

国际友城与企业走出去 ——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韩永辉 王贤彬 韦东明*

摘要: 本文基于国际友城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考察国际友城的企业海外并购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数量和交易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国际友城的并购事件促进效应在企业产权中不具有分化效应,但并购规模效应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国际友城的促进作用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友城的促进作用兼具边际效应和增量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国际友城通过促进民间互访、民间经贸交流、民间文化交流等作用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拓展性检验表明,国际友城与政府外交存在互补性,二者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相互促进;制度性约束检验表明,优越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国际友城的并购事件促进效应,但对并购交易规模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拓展了对外经贸关系,特别是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分析框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 国际友城; 海外并购; 双边关系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日趋扩大,刺激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变迁。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和国际化都市的崛起,使得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中显得愈发重要,并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生活、经贸合作、教科文交流和生态治理的网络节点和重要载体。国际友好城市(简称“国际友城”)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总体外交和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友城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商业和文化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友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升温,推动双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进步。随着国际友城兴起,其拥有一定的外交职能,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外交形态。伴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交流蓬勃发展,国

* 韩永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邮编: 510420), E-mail: 150149594@qq.com; 王贤彬,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邮编: 510632), E-mail: wangxianbin123@163.com; 韦东明(通讯作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编: 100871), E-mail: weidm@pku.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4)、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22GZZB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3041; 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2B151502000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22TWCXGC12)的资助。

际友城成为中国国际民间交往的重要内容。

国际友城具有官民并举的独特性、稳定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正式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国际友城通过异国城市间政治、商业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广泛的交流,强化了国际友城间政治经济社会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友城间经济互信,推动双边商业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进步。在中国国际友城的发展过程中,中央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布《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规定》,对国际友城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地方政府也积极拓展自身的城市网络。在国际友城深化合作的过程中,国际友城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行为体在各领域开展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桥梁作用。伴随着中国国际友城网络持续扩大,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对外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合作成果,企业海外并购发展成效突出。2006—2017年,中国海外并购总交易金额从260亿美元增加到1480亿美元,12年间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率达17%。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经济纠纷、文化冲突等不确定因素已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对此,中国国际友城奉行互利共赢、求同存异、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减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冲突对海外并购的不利影响,以推动对外投资的务实合作。国际友城的影响作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相关的学者们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国际友城是中国跨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对贸易出口、国际投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杨连星等,2016;陈烨等,2020),然而少有涉及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旨在立足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理论,采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友城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内在机制及其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可能的创新为:①在研究视角上,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两国政府间所建立的正式制度安排或者国家政府主导的政治外交关系,也有研究对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经济影响展开讨论,我们在本文则考察了国际友城的经济效应。②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国际友城的对外贸易效应,而鲜有研究涉及国际友城的并购效应。本文从宏观层面具体考察国际友城这种民间交流载体对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更具研究深度。③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宏观数据集考察两者的逻辑关系,不仅重点考察国际友城对海外并购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从民间互访、民间经济交流、民间文化交流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而且还系统考察了政治外交和国际友城的互补效应,探讨了制度约束对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可以得到较为丰富稳健的结论。④本文研究为深化中国国际友城工作开展和为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了基础依据与经验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 文献综述

针对影响海外并购因素的研究文献中讨论最为集中的因素是制度环境因素。在国际经济理论当中,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制度因素包括了国家政府主导的政治关系和

国家政府主导的民间关系。早期研究聚焦于正式制度和双边政治关系，认为良好的制度因素对海外并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Nigh, 1986)。部分研究文献从外交关系、领导访问等维度对双边政治关系与海外并购的关系进行分析，也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陈岩等, 2014)。此外，避税、筹资、投机、企业增值等因素也被认为是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动机(George, 1995; Dunning 和 Lundan, 2008; 顾露露等, 2017)。现有国内文献关于国际友城的外交定位界定，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友城与国家外交具有多样性的统一关系，国际友城可以与国家外交保持合作共赢关系(陈志敏, 2001)。国际友城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非制度性，强调非主权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政府主导的政治关系进行广泛讨论，以及从非正式制度的因素进行研究，鲜有从国际友城的视角展开研究。国际友城与国家外交关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两者的共性在于其都是两国双边关系，差异在于国际友城是双边关系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其更能体现民间团体的偏好与意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国际友城民间交流模式快速兴起，推动双边互信和经贸发展。近年来，中国国际友城的民间交流工作不断推进，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加。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国际友城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定性分析(龚铁鹰, 2004; 赵可金, 2014)，国际友城的民间经贸促进作用往往被学界忽视。个别学者从对外贸易投资和入境旅游方面分析国际友城的民间交流效应。例如，杨连星等(2016)基于 2005—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发现国际友城交流能够显著提升对外投资成功率。王亚辉等(2017)利用中国 38 个主要客源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际友城促进了入境游客的增加。陈焯等(2020)发现，国际友城有利于促进城市出口网络发展。韦永贵和张艺川(2021)发现，以国际友城为代表的跨国文化载体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这些文献针对国际友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少有研究涉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连增等(2021)的研究与本研究在出发点上比较接近。他们也强调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中外沟通平台的影响，并以中资企业的并购金额、并购次数和并购成功率的变化来评估国际友城的影响作用，认为国际友城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的总金额和并购次数，但对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友城的民间友好交往模式不仅包含了跨国文化传播等内容，更是涵盖了推动地方政治互信、经济合作等重要范畴，因此国际友城有助于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民间友好工作。由于国际友城是官方政府外交的重要从属形式，国际友城与官方正式外交的互动也同样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与连增等(2021)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从国际友城的独特功能出发，评估国际友城的经济效益，从理论与实证层面上考察国际友城的民间互访、民间经济交流、民间文化交流三方面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国际友城与官方政府外交的互补性。

本文基于国际友城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的典型事实，考察国际友城的企业海外并购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深化中国国际友城工作开展和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体系提供了基础依据与经验基础。

(二) 理论机制

国际友城作为双边官方交往的延展和补充,是衡量双边紧密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两国友好城市之间通过组织国际友城代表团互访,举办城市间的经济研讨会、政治协商会、商业论坛、文化展览等交流活动的民间交流行为,能很好地提升双边经济利益密切度(查雯,2016)。

国际友城主要从推动民间非正式化外交活动、促进民间经济往来、推进双边文化交流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海外并购。

一是,国际友城可以通过非正式化互动,推动地方实践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实施,推动双边经济与投资合作。国际友城有利于带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通过丰富多样的交流平台来实现资源的共享共赢共建,从而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国际友城发展和活动必然要求搭建各类国内外交往平台,拓展各类地方政府对外交往渠道。国际友城通过举办研讨会、洽谈会、论坛等交流平台,推动两国企业在经贸、文化、科技、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促进地方政府间的互信建设。这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Han等,2022),为推动企业共同合作创造条件,从而提高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的互信和经贸合作水平,有助于推动海外并购业务发展,夯实双边关系的社会经济合作基础。

二是,国际友城交流可以通过民间经济交流活动加强双边经济联系,从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发展。通过非正式化的民间经济交流活动,如组织商业代表团互访等民间各种商务组织和交流,促进双方在经济、科技、人才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增进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在经贸发展需求方面的相互了解,提高双方企业经贸合作的匹配度(Ramasamy等,1998),有效减少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成本。此外,国际友城的经贸交流有助于为双边经济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产业项目、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建立合作平台,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从而推动双边城市经济共同发展,为国际投资合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是,国际友城通过推动双边文化交流活动,有利于降低双边沟通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障碍,促进中国企业对外并购发展。国际友城的建立初始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增进相互友谊,从而促进共同发展。通过派出和接待文化艺术团体和人士进行友好访问、举办演出和展览、举行文化庆典等文化交流活动,推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交流,通过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来拓展软实力构建中的文化影响力。国家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根基所在,中华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以“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理念促进中外文化融合。这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增强文化感染力的过程中推进了民心相交和共识凝聚,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张虹倩和胡范铸,2017),有利于消除以往存在的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误解,也更利于形成对中国和平与发展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友城通过文化团体互访和演出交流,能够增加双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减少文化异质性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提升双方企业的文化整合水平,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更为友好的文化环境。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机制,本文根据既有文献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Buckley 和 Liu, 2007)。其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SISC_{it} + X'_{it}\varphi + \et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东道国和年份时间, Y 代表中国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情况, 包括并购数量和并购交易金额; $SISC$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的国际友城数量; X_{it} 代表控制变量; η_i 代表国家虚拟变量; δ_t 代表年份虚拟变量; ε_{it} 代表扰动项。由于本文采用了地理距离、华人文化圈、领土接壤、发达国家等虚拟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 基于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方法(LSDV)进行检验(谷媛媛和邱斌, 2017)。本文采用聚类到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考虑到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 即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问题, 本文有必要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在遗漏变量处理方面, 首先, 国际友城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形式, 可能会受到每个国家不可观测的区域特征的影响, 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 本文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η_i 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 国际友城的建立可能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 本文通过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δ_t 来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 在反向因果关系处理方面, 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的经济往来联系愈发密切, 可能为积极建立国际友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因而本文在内生性检验部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虚拟变量(WWP)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此外, 由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能还受到其他双边关系和并购动机的影响, 仅仅采用国际友城进行检验可能会高估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内生性检验部分进一步控制可能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双边关系变量以及并购动机变量, 以解决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由于采用企业数据面临样本量稀疏问题, 即实际发生城市间并购的城市样本量很少, 难以在城市层面展开研究。因此, 本文采用双边友好城市在国家层面的配对样本, 构建“国家-年份”的面板数据。考虑到城市因素依然是影响友好城市对城市间并购的重要方面, 本文在稳健性分析部分采用企业数据进行城市配对的回归分析。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数据缺失的国家样本进行剔除后, 选取了 141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6—2017 年。

海外并购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WIND)。本文收集整理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数据和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数据。参考已有文献(洪联英等, 2015), 本文进行如下筛选: ①选取并购方企业总部位于中国大陆且被并购方企业总部位于境外地区的样本, 并剔除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样本; ②由于小并购事件影响较小, 因而剔除交易金额小

于100万元的样本;③剔除金融类的主并购企业;④剔除避税天堂的样本;⑤采用并购标的为企业股权份额的样本;⑥剔除中国企业为投资团体或个人的样本;⑦剔除并购信息不完整的样本。经筛选,本文最终获得中国对72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242个并购案例的样本,最终构成141个国家面板数据,共计1692个观测值。

(三)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数量和交易金额进行衡量。其中,海外并购案例数包括意愿并购数量(*MERC*)和成功并购数量(*MERS*),并购交易金额包括意愿并购交易金额(*MCNUM*)和成功交易并购金额(*MSNUM*),本文对被解释变量的原数据加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解释变量采用中国与东道国国际友城数量(*SISC*)进行衡量。本文以双边建立的国际友城存量表示,并加总至国家面板层面。根据《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规定》,国际友城工作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管,归属外交部领导。一般而言,中国地方省市与东道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需要中国地方与东道国城市双方签署同意结好意向书并且具有正式结好意愿,向地方政府外事办提交申请,最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批复同意,并转中国外交部批准。研究样本内,中国已与11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立了2156对国际友城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本文对解释变量的原数据加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控制变量含以下变量。①制度质量(*INS*),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的指标均值衡量。②双边汇率(*ER*),采用东道国兑母国的货币汇率进行衡量。③通货膨胀率(*INF*),选用东道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衡量。④总劳动人口(*POP*),采用东道国劳动力总量衡量。⑤人均GDP(*GDP*),采用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⑥经济距离(*EDIS*),将中国与东道国的人均GDP的差值取绝对值。⑦地理距离(*GDIS*),采用中国与东道国的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⑧华人文化圈虚拟变量(*PCI*),东道国是否处于华人文化圈中,若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⑨是否与中国接壤的虚拟变量(*NEIGH*),东道国是否与中国存在领土上的接壤关系,若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⑩是否为发达国家虚拟变量(*DEV*),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0年人文发展报告》标准,若为发达国家赋值为1,若为发展中国家则赋值为0。上述变量根据其数据形式相应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 基本实证分析

表1为基本实证结果。

表1第(1)列和第(2)列为中国企业意愿并购数量的实证结果,第(3)列和第(4)列为中国企业成功并购数量的实证结果。从其中可以发现,国际友城数量(*SISC*)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了国际友城既对中国企业意愿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又对中国

表1 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7)	(8)
	MERC		MERS		MCNUM		MSNUM	
SISC	0.2685** (0.100)	0.2541** (0.106)	0.0765*** (0.025)	0.0707*** (0.026)	0.1277*** (0.039)	0.1087*** (0.039)	0.0910*** (0.031)	0.0905*** (0.033)
INS	0.0678* (0.039)	0.0579 (0.040)	0.0289* (0.015)	0.0228 (0.015)	0.1117* (0.066)	0.1289* (0.070)	0.1002* (0.059)	0.1320** (0.057)
ER	-0.2624 (0.171)	-0.0544 (0.241)	-0.1709** (0.068)	-0.1166* (0.069)	-0.5604*** (0.207)	-0.2605 (0.202)	-0.4505** (0.190)	-0.3319 (0.204)
INF	0.0070 (0.007)	0.0100 (0.008)	0.0004 (0.002)	0.0010 (0.002)	-0.0053 (0.010)	-0.0001 (0.013)	-0.0008 (0.007)	-0.0019 (0.009)
POP	0.1861 (0.1160)	-0.0354 (0.062)	0.0501 (0.032)	-0.0317 (0.021)	0.0397 (0.088)	-0.0550 (0.081)	-0.0814 (0.072)	-0.1142 (0.094)
GDP	-0.3340 (0.279)	-0.7914** (0.336)	-0.1904* (0.107)	-0.2420** (0.111)	0.6161 (0.518)	0.4672 (0.619)	0.4018 (0.343)	-0.4960 (0.421)
EDIS	0.1545 (0.152)	0.1207 (0.149)	0.0670 (0.049)	0.0547 (0.051)	-0.0318 (0.070)	-0.0359 (0.072)	0.0065 (0.183)	0.0107 (0.187)
GDIS	1.5212*** (0.405)		0.6822*** (0.171)		0.2064*** (0.044)	0.1084** (0.049)	0.1171*** (0.041)	
NEIGH	1.0643*** (0.342)		0.4751*** (0.142)		1.4510*** (0.351)	0.3859 (0.444)	0.8926*** (0.321)	
PCI	-5.7996 (5.509)		-0.3587 (1.451)		0.9449** (0.468)	1.9777*** (0.541)	1.1493*** (0.396)	
DEV	-0.3652 (0.335)		-0.4953 (0.833)		0.0391* (0.021)	0.0963*** (0.030)	0.0427*** (0.016)	
CONS	-160.2411*** (49.561)	-71.8727*** (27.420)	-67.0110*** (18.127)	-71.8727*** (27.420)	-197.1999*** (38.208)	-62.6945 (53.154)	-127.7253*** (35.117)	-71.8727*** (27.420)
个体固定效应	N	Y	N	Y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N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R ²	0.746	0.748	0.722	0.727	0.561	0.565	0.509	0.514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小括号中为稳健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企业成功并购具有积极作用。这意味着国际友城数量越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意愿事件和成功事件的积极作用更强。由此说明，国际友城既能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又能促进这些海外并购事件的成功实现。

第(5)列和第(6)列为中国企业意愿并购交易金额的实证结果，第(7)列和第(8)列为中国企业成功并购交易金额的实证结果。从其中可以发现，国际友城(SISC)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了国际友城同样可以促进中国企业提升并购意愿并购交易金额和成功并购交易金额，推动中国企业并购规模扩大。总体而言，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有着显著的稳健促进作用。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既有助于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增加，又是并购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 稳健性分析^①

1. 内生性检验

国际友城可能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可能由于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的经济往来联系愈发密切,推动双边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快速跨境流动,从而为地方政府积极建立国际友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因而可能对系数估计具有非一致性与有偏性。为了排除上述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本文参考蒋冠宏等(2013)的经验做法,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基于能够影响国际友城缔结而又不能直接影响海外并购的考量,本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虚拟变量是国际友城变量(*SISC*)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国际友城最早发源于西欧国家的姐妹城市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英国约克郡凯里市和法国普瓦市结为世界上第一对友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德两国民众深切体会到战争带来的不幸,1945年德国提出建立城市间稳定友好交流关系的倡议,得到法国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1972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为进一步深化中日友好邦交,1973年6月,中国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释放两国间友好善意。由此可见,建立国际友城的目的主要在于加强战后各国之间民众情感交流,弥合人民感情裂痕,促进国家之间关系和睦。因此,推动参战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众情感交流是国际友城建立的重要出发点,满足相关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是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对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较小,从而满足外生性。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虚拟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本文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互项(*WWP*)作为工具变量。尽管理论上工具变量法有助于解决内生性问题,然而不能确保本文的工具变量具有严格的外生性。Conley等(2012)首次提出近似外生的IV估计法,该方法通过放松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约束,以考察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采用近似零方法(LTZ)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对于遗漏变量的问题,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对海外并购影响较大的变量进行控制,本文从控制更多双边变量和控制海外并购动机两方面对可能的遗漏变量进行检验。

本文先从双边关系的不同角度刻画国际友城的影响效应。第一,控制双边政治关系。国家领导人的外交行为有助于直接推动两国间在企业 and 行业等多层面的合作,是衡量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中国外交》统计年鉴搜集整理领导人访问数据,以衡量双边外交政治关系。此外,联合国大会为国际政治提供了平台,各个国家对联合国议题的投票行为代表着每个国家对相关议题的政治偏好,也代表着国家间的国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本文参考Bailey等(2017)的经验做法,以中国与各国联合国投票理想点数值之差的绝对值衡量。第二,控制双边文化距离。本文采用Hofstede等(2005)的文化距离指标进行衡量,并相应构建文化距离指标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第三,本文引入多个双边关系和双边差异的控制变量全面刻画双边关系。(1)构建是否

^① 读者可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获取电子版附录。

在 1972 年以前与中国建交的虚拟变量。一般而言,1972 年以前与中国建交的属于传统友好外交关系,赋值为 1;而 1972 年后建交的属于东西方关系正常化外交关系,赋值为 0,并相应构建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2)构建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虚拟变量,以控制双边意识形态差异。本文将曾经或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并相应构建社会主义国家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3)构建是否为战略伙伴关系虚拟变量。本文将当年及以后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4)构建是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若当年及以后签署“一带一路”相关文件的国家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5)构建各国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态度的虚拟变量。2005 年中国制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本文基于 Kastner (2016) 关于各国官方态度的分析研究,若官方态度为“表示支持”和“表示尊重”则赋值为 1,“表示反对批评”则赋值为 0,并相应构建反分裂国家法态度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6)构建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虚拟变量。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并相应构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7)构建各国对中国处理反恐问题的态度的虚拟变量。本文基于新闻搜索方式,对表示支持和尊重该措施的国家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并相应构建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之后,本文参考文余源和杨钰倩(2021)的处理方法,纳入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技术寻求动机等并购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动机以东道国 GDP 衡量市场规模,资源寻求动机以矿物、金属、燃料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衡量,技术寻求动机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衡量。其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2. 地区匹配检验

考虑到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国与东道国在城市层面的配对关系,单纯采用国家层面的友好城市总量进行衡量可能存在有偏性。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企业并购样本考察缔结城市对与海外并购成功率和并购规模的因果关系,以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检验。因此,基于企业的微观并购交易数据,整理中国企业与被并购企业的所属城市信息,并构建企业所在城市的双边友好城市变量(*SISCcity*),若中国企业与被并购企业的所属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Y_{jt} = \alpha + \beta SISC_{jt} + X'_{jt}\phi + \eta_j + \delta_t + \varepsilon_{jt} \quad (2)$$

其中, j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Y 代表中国企业 j 海外并购情况,主要包括并购完成率和并购规模。其中,并购完成率采用海外并购是否完成虚拟变量(*COMP*)进行衡量,若交易状态为“完成”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并购规模采用企业意愿并购交易金额(*MERC*)和成功并购交易金额(*MERS*)衡量。 X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在基准模型(1)的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基础上,增加一系列中国区域层面、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具体包括:①地区对外开放,采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占 GDP 比例衡量;②经济水平,采用 GDP 人均值进行衡量;③企业并购状况,若中国企业在发起并购前的三年内并购过东道国其他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④企业并购经验,中国企业在发起并购前已完成的并购数量;⑤控制权并购虚拟变量,若股权收购比例大于 50%,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⑥国有企业虚拟变量,若为国有企业赋值为 1,反之为 0。由于并购完成率为二元

变量,因而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其实证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到友好城市的海外并购作用可能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本文增加个体-时间的固定效应进行检验。第二,本文为排除异常值的干扰,对样本变量最高和最低 5% 进行缩尾处理。第三,将变量标准化后进行检验。第四,考虑到中国企业海外意愿并购和成功并购存在较多零值,本文采用泊伯松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友好城市变量(SISC)依然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产权异质性

为验证企业产权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参考李诗等(2017)的经验做法,分别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并购案例和交易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其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产权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MERC	MERS	MCNUM	MSNUM	MERC	MERS	MCNUM	MSNUM
SISC	0.1833** (0.091)	0.0719** (0.033)	0.1226*** (0.030)	0.0834** (0.037)	0.2634*** (0.086)	0.1539*** (0.042)	0.0745 (0.047)	0.0638 (0.04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N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R ²	0.764	0.725	0.570	0.520	0.895	0.766	0.565	0.510

表 2 的检验结果显示,国际友城(SISC)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了国际友城均显著推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并购数量增加。此外,对于被解释变量为交易金额而言,国际友城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国际友城均具有明显的并购促进效应,但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际友城更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扩大并购规模。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较为雄厚的资本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因此国际友城对国有企业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强;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其海外并购能力日益增强,国有企业正逐步转为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企业,具有“走出去”的强大驱动力。

2. “一带一路”异质性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加强推动国际友城交流活动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基于此,本文引入“一带一路”64 个沿线国家的虚拟变量(BRI),并构建国际友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SISC×BRI),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异质性作用,结果如表 3 所

示。从中可以发现,交互项 $SISC \times BR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了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意味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沿线国家国际友城建设事业也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民间对外交流合作,为对外交流合作开创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异质性检验

	(1)	(2)	(3)	(4)
	<i>MERC</i>	<i>MERS</i>	<i>MCNUM</i>	<i>MSNUM</i>
<i>SISC</i> × <i>BRI</i>	0.0763* (0.043)	0.0571* (0.030)	0.0698* (0.038)	0.0514** (0.026)
<i>SISC</i>	0.2047** (0.097)	0.0692*** (0.023)	0.1109*** (0.040)	0.0811** (0.034)
控制变量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i>N</i>	1692	1692	1692	1692
<i>R</i> ²	0.462	0.251	0.105	0.052

3. 边际影响异质性

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可能存在两方面的边际影响:一方面,相较于未建立国际友城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国际友城关系的国家往往具有更高的双边经贸交流水平,从而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即存在边际效应。因此,本文构建国际友城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检验,若该年其与中国存在国际友城关系,则赋值为1,否则为0。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国际友城关系,新增国际友城可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双边投资深化发展,即存在增量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当年国际友城的新增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国际友城(*SISC*)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了国际友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同时具有边际效应和增量效应,即无论是具有国际友城关系还是新增国际友城,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表4 边际影响检验

	(1)	(2)	(3)	(4)	(5)	(6)	(7)	(8)
	边际效应				增量效应			
	<i>MERC</i>	<i>MERS</i>	<i>MCNUM</i>	<i>MSNUM</i>	<i>MERC</i>	<i>MERS</i>	<i>MCNUM</i>	<i>MSNUM</i>
<i>SISC</i>	0.4584** (0.213)	0.2303** (0.097)	1.4005*** (0.355)	1.0973*** (0.303)	0.9336** (0.434)	0.4313** (0.202)	0.5744*** (0.129)	0.5470*** (0.102)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i>N</i>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i>R</i> ²	0.125	0.136	0.262	0.213	0.339	0.377	0.421	0.366

五、机制分析与拓展检验

(一) 影响机制检验

国际友城的活动一般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青少年活动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民间非正式互访,如研讨会、经促会,文化交流等方式,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基于此,这对海外并购可能存在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国际友城的非正式化活动有利于推动国际友城加快投资合作进程,通过双边民间友好交往和组织商业代表团互访等民间各种友好交流方式,带动母国资本跨国流动,推动投资并购发展。二是国际友城通过主办双边经贸研讨会、经济论坛等民间经贸交流活动,搭建双边经济合作平台,从而为双边经济合作提供机会,有利于促进双边互信和经济合作交流,降低中国对外投资并购的交易成本,夯实双边经济关系的合作基础。三是国际友城可通过举办文化交流论坛、举办文化展览、文化团体互访等活动促进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双边文化认同感,有助于减少在开展并购业务过程中文化异质性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提升东道国的信任度,从而降低双边经贸合作交易成本和产品搜寻成本,最终提升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并购效益。因此,本文从民间互访、民间经济交流、民间文化交流三个渠道来检验国际友城的并购影响效应。本文通过观测核心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其模型具体设定为:

$$IM_{it} = \alpha + \lambda SISC_{it} + X_{it}'\phi + \et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IM 代表机制变量,包括民间互访、民间经济交流、民间文化交流。

第一,民间互访机制。本文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各省份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网站收集整理双边友好互访数据,构建民间互访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验证了民间互访是国际友城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机制。

第二,民间经济交流机制。本文基于双边经贸交流活动举办次数,检验国际友城的经贸交流活动的机制效应,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各省份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网站。表5第(2)列的实证结果也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1)	(1)	(1)
	民间互访	民间经济交流	民间文化交流
$SISC$	0.0636*** (0.012)	0.0391*** (0.007)	0.0645*** (0.019)
控制变量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N	1692	1692	1692
R^2	0.540	0.570	0.835

证明了国际友城效应存在民间经济交流机制。

第三,民间文化交流机制。本文采用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举办次数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各省份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网站。表5第(3)列为国际友城效应的民间文化交流的机制效应检验,也证明了国际友城效应存在民间文化交流机制。

(二) 拓展性分析——制度性约束

考虑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东道国制度的约束可能较大,从而导致后期并购整合受到较大阻碍,降低并购成功率,本文引入国际友城变量与制度约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检验。其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Y_{it} = \alpha + \beta_1 SISC_{it} + \beta_2 SISC_{it} \times CV_{it} + CV_{it} + X'_{it} \varphi + \et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CV 代表制度约束变量,具体包括制度环境、规范制度、规制制度。制度环境以《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指标平均值衡量;规范制度以全球清廉指数衡量,数据来源于国际透明组织;规制制度以世界银行发布的法律权利力度指数衡量。由于法律权利力度指数自2013年起才开始公布,因而规制制度以2018年法律权利力度指数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进行衡量。

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一方面,在以意愿并购数量($MERC$)和成功并购数量($MERS$)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国际友城与制度约束变量的交互项($SISC \times$ 制度环境、 $SISC \times$ 规范制度、 $SISC \times$ 规制制度)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东道国制度约束越强,国际友城的并购数量促进效应越强。另一方面,在以意愿并购交易金额($MCNUM$)和成

表6 制度性约束分析

	(1)	(2)	(3)	(4)	(5)	(6)
		$MERC$			$MERS$	
$SISC$	0.2273** (0.107)	0.2156* (0.121)	0.2037 (0.125)	0.0497* (0.028)	0.0560* (0.033)	0.0492 (0.034)
$SISC \times$ 制度环境	0.1569*** (0.049)			0.0407*** (0.015)		
$SISC \times$ 规范制度		0.1221** (0.048)			0.0309** (0.012)	
$SISC \times$ 规制制度			0.0073** (0.003)			0.0019** (0.001)
制度环境	0.0663* (0.040)			0.0421 (0.039)		
规范制度		0.1330** (0.065)			0.0562 (0.067)	
规制制度			0.0074** (0.003)			0.0020**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R^2	0.799	0.804	0.816	0.723	0.724	0.729

续表 6

	(7)	(8)	(9)	(10)	(11)	(12)
	MCNUM			MSNUM		
<i>SISC</i>	0.1367*** (0.031)	0.1484** (0.072)	0.1460** (0.071)	0.0939*** (0.021)	0.1066** (0.053)	0.1205** (0.056)
<i>SISC</i> × 制度环境	0.0122 (0.031)			0.0040 (0.023)		
<i>SISC</i> × 规范制度		0.0149 (0.027)			0.0015 (0.023)	
<i>SISC</i> × 规制制度			0.0003 (0.001)			0.0005 (0.001)
制度环境	0.1059** (0.054)			0.0771* (0.043)		
规范制度		0.3937** (0.173)			0.2647 (0.252)	
规制制度			0.0086 (0.024)			0.0028 (0.023)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个体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i>N</i>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1692
<i>R</i> ²	0.561	0.561	0.561	0.508	0.508	0.508

功并购交易金额 (*MSNUM*) 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 国际友城与制度约束变量的交互项 (*SISC* × 制度环境、*SISC* × 规范制度、*SISC* × 规制制度) 不显著, 说明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规范环境和规制环境不是影响国际友城对海外并购交易规模效应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 一方面, 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吸引海外投资流入和推动并购规模扩大, 呈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 这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王恕立和向姣姣, 2015)。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进入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东道国, 需要付出更高的寻租成本和额外交易成本, 因此东道国的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际友城的促进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 国际友城有助于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营造和谐、宽松的投资环境。本文采用企业海外并购数据考察了国际友城的企业海外并购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 国际友城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数量增加和交易规模扩大; 国际友城的并购事件促进效应在企业产权中不具有分化效应, 但海外并购交易规模效应集中于国有企业;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国际友城对沿线国家的并购促进作用愈发明显; 国际友城与政府外交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 政府外交和国际友城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相互促进; 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国际友城的并购事件效应, 但对并购交易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国际友城通过促进民间互访、民间经贸交流、民间文化交流等作用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持续影响。

本文从企业走出去的角度，验证了国际友城作为民间交流的重要形式，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于阐释如何通过国际友城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跨国并购合作，加快双边在全球价值链协同产业升级，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经验参考价值。未来中国应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既要在国家层面构建国家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又要大力发展国家之间的民间友好交往，加强双边在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方面互联互通，提升中国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努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 [1] 陈岩, 翟瑞瑞, 郭牛森. 基于多元距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4(11): 2760-2771.
- [2] 陈焯, 谢凤燕, 王珏, 等. 中国友好城市关系是否促进了城市出口贸易——基于二模网络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5): 89-101.
- [3] 陈志敏. 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M].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
- [4] 龚铁鹰.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 功能及政治走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8): 37-42.
- [5] 谷媛媛, 邱斌.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4): 83-94.
- [6] 顾露露, 雷悦, 蔡良.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制度环境解释——基于倾向配比评分的全现金支付方式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12): 36-46.
- [7] 洪联英, 陈思, 韩峰. 海外并购、组织控制与投资方式选择——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10): 40-53.
- [8] 蒋冠宏, 蒋殿春, 王晓娆. 契约执行效率与省区产业增长: 来自中国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3(9): 49-68.
- [9] 李诗, 黄世忠, 吴超鹏. 中国企业并购敏感性海外资产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7(3): 99-121.
- [10] 连增, 李超, 胡慧杰. 国际友好城市与中资企业跨国并购——基于 Zephyr 全球并购分析交易库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21(10): 147-164.
- [11] 王恕立, 向姣姣.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财经研究, 2015(5): 134-144.
- [12] 王亚辉, 全华, 尹玉芳. 国际友城的人境游效应——来自中国 38 个客源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7(3): 14-161.
- [13] 韦永贵, 张艺川. 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J]. 南方经济, 2021(11): 97-121.

- [14] 文余源, 杨钰倩. 投资动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学家, 2021(1): 81-90.
- [15] 杨连星, 刘晓光, 张杰.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1): 56-72.
- [16] 查雯, 刘云, 周幻. 从“交流”到“合作”: 日本在东南亚的城市外交[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6(6): 84-104.
- [17] 张虹倩, 胡范铸.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 问题、因由与对策[J]. 社会科学, 2017(10): 26-35.
- [18] 赵可金. 嵌入式外交: 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1): 135-154.
- [19] Bailey M. A., Strezhev A.,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2): 430-56.
- [20]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21] Conley T. G., Hansen C. B., Rossi P. E. Plausibly Exogenou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 94(1): 260-72.
- [22] Dunning J. H., Lundan S. M.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5(4): 573-93.
- [23] George V. P. Globalization Through Interfirm Cooperation: Technological Anchors and Temporal Nature of Alliances across Geographical Bounda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1995, 10(1): 131-45.
- [24] Han Y., Wang H., Wei 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ster-city Partnership and Chinese Outward FDI[J]. Economic Research-Ekonomiska Istraživanja, 2022, 35: 3416-36.
- [25]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Minkov M.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M].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 [26] Kastner S. L. Buying Influence?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6, 60(6): 980-1007.
- [27] Nigh D.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86, 7(2): 99-106.
- [28] Ramasamy B., Cremer R. D. Cities, Commerce and Culture: The Economic Role of International Sister-c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Asi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998, 3: 446-61.

Friendship City and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Chinese Experience

Han Yonghui¹, Wang Xianbin² and Wei Dongming³

(1.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on-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l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s created a "soft power" environment for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ypical fact that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enterprises in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re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umber of overseas M&A events and transaction sca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2)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M&A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has no differentiation effect in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s, but the M&A scale effect is concentrated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focuses o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has both marginal and incremental effects; (3) Th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had an impact on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y promoting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 visits,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non-government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other mechanisms. (4) Extensive tests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and government diplomacy are complementary,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test found that the superio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helped to enhanc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M&A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ale of M&A transactions. This study has found a measurable perspective of folk diplomacy, expanded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especially enterprises'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provided policy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building a high-level open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Civil Diplomacy; Sister Cities;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ilateral Rela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F21 M16 O11

(责任编辑: 刘 威)

(责任校对: 张鲁瑶)